



經濟發展，政治轉變，
和香港青年人的
後物質轉向

著—— 李立峯 鄧鍵一

經濟發展，政治轉變，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轉向

李立峯、鄧鍵一 著

發行：HKSC X jcMotion@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主編：張少強、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

編輯：張嘉輝

《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運作宗旨在於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劍拔弩張，跨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追求發展主義的都市想像，不時由新媒體打開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戰結構的中港對立，仍在重塑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張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抗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社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當中「本土」，「殖民」，「國族」及「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在這個華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之下，「用英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已屬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制的正式認同。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間，為香港本土出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

由2002年起，一眾香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份認同；
-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 8) 介入當下的香港現況，對回歸中國的香港進行切要的記述；
-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會所得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流，期望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可能性。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jcmotion@cuhk.edu.hk

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品通過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版。

Copyright © 2013 (李立峯、鄧鍵一).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李立峯、鄧鍵一 (2013)。 *經濟發展，政治轉變，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轉向* [電子版]。張少強、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張嘉輝 (主編)。香港：jcMotion。取自<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目錄

經濟發展，政治轉變， 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轉向

李立峯、鄧鍵一

引言

社會科學的抽象名詞往往較少會在香港的大眾媒體反覆出現。Ronald 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卻是一個異數。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中以關鍵詞作搜索，「後物質主義」一詞於2004及2005年左右開始間歇地在媒介中出現。當時，一些評論員借用該概念來嘗試解釋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香港面對的管治問題及社會訴求。到了保育運動興起，一些論者則借用後物質主義來討論本土社會運動的演變，例如：葉秋（2007）在《明報》的說法，「保衛天星皇后的社會運動，象徵香港的社運走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它並非單純的要求物質，或者社會資源分配或再分配，它強調的是社會的價值觀念。」

公共論述對後物質主義的關注在2010年隨著反高鐵運動到達了一個高峰。這一次，評論的重點不單在於香港社會是否已經在整體層次上進入後物質年代，亦見在於年青的一代是否比上一代或上幾代的香港人更嚮往後物質價值。施家潤（2010）的說法可算是對Ronald Inglehart的理論最簡單直接的套用：「『八十後』存在的時空，卻是個物質富裕的時空……『八十

後』的物質需求已被滿足，因此他們自然地追求物質以外的價值，如綠色經濟和社會公義，高鐵事件正正是當中的實例。」較為有趣的有左霏（2010）在《信報》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見解，指Inglehart的理論在香港局部失效。他認為香港的年青人並不是在物質滿足了之後才轉向後物質價值：「八十後要面對比前人更多的就業問題和基本住屋問題，但他們仍然選擇追求比物質更高層次的東西。」究其原因，左霏認為在現今的香港社會，物質滿足比後物質價值更遙不可及，「計算上來，與其只能停留在馬斯洛金字塔的最低層，何不勇敢的『站起來』，跳到金字塔的頂點？」

當然，公共論述中也存在著一些對後物質主義理論的質疑。一種批評認為把後物質主義套用到香港青年身上，是把青年人描寫成驕生慣養，不能吃苦的一代。這種批評建基於一種對後物質主義的誤解，這樣的誤解又關乎到當時香港社會的評論場域中有甚麼人以甚麼方式談論後物質主義，這點在此不贅。另一種質疑則在於物質和後物質之間是否可以切割。陳雲（2010）認為道德覺醒不分先後。張小康則打趣地說：「年頭反高鐵時，聽到有人話乜嘢後物質年代，老實講，唔多知佢咁講乜，我淨係知道自己關心社會同理想拯救地球之餘，都鍾意食好嘢，住好啲，久唔久買番對復刻版波鞋，其實兩者無必然衝突。」（林慧時，2010）

最後一種質疑則在於香港的年青人是否真的「後物質」，像馬傑偉（2010）在專欄裡感嘆：「無端掉出來『後物質青年』這個名詞。今天香港青年都很物質主義呀。由頭到腳都掛著、背著、穿著潮流消費品。聖誕樹一樣。叮叮噹噹。單是電話繩已是一大串。」值得一提，2012年7月，社交網站廣泛地流傳一張報章圖片，十幾位中學高考狀元，報讀的大學首選幾乎

全是商科和金融。另一邊廂，黃之鋒等中學生們在反國民教育運動中走到最前線。兩者在網上都引發了很多討論。到底香港的青年人是真的整體地較上一代更傾向後物質價值，抑或年青人中在物質與後物質的問題上有兩極化的趨勢？

以上述的社會討論為背景和出發點，本文嘗試回到系統地搜集到的經驗資料來處理幾個基本問題：到底有沒有證據顯示香港的年青一代比他們的上幾代更傾向後物質價值？如果時下的年青人真的較傾向後物質主義，那麼他們的後物質轉向的成因是甚麼？和Ronald Inglehart的原理論對照，香港的後物質轉向有甚麼特徵？就此，香港文化指標研究計劃在2012年5月進行了第一次的調查研究。同時，從2011年中到2012中，研究計劃亦進行了一連串的焦點小組訪談，本文主要分析調查研究數據，並輔以焦點小組的發現來解答以上問題。但在分析研究資料前，我們會先簡述後物質主義理論，並簡要地回顧在西方以及香港進行過的相關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發現。

後物質主義理論和研究發現

Inglehart早在1977年《The Silent Revolution》一書中提出西方的發達工業社會出現了後物質轉向的說法（Inglehart, 1977）。13年之後，他又在《Culture Shift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一書中討論後物質主義，並運用更多的數據佐證其理論觀點（Inglehart, 1990）。簡而言之，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理論建基於兩項主要假設。第一項假設是稀有假設（scarcity hypothesis），指人們一般會傾向追求一些比較稀有的東西。物以罕為貴，這項假設並沒有甚麼特別具爭議性的地方。但Inglehart的稀有假設是要配合馬斯洛的需求階梯來理解的，亦即一般人會先求人身安全和溫飽這些最基本的目標，在達成了基本目標後才會追求一些較高層次的和精神性的滿足。

Inglehart的第二項假設是社會化（socialization hypothesis），就是一個人的政治和社會價值理念，主要是在個人成長時期發展出來的。到了一個人成年之後，價值轉變會變得較為困難。這裡便帶出了世代差異（generational differences）的問題，社會化假設的其中一個附帶結果，是一個社會的文化轉變主要是由新舊世代更替來推動的。社會變遷對已達成年的人民不會有太大和深遠的影響，所以文化和價值的大轉變不會即時出現，而是往往要等到若干時間之後，在社會變遷中長大的新一代成為社會核心時才會明顯地出現。跟稀有假

設一樣，社會化假設亦不是Inglehart獨創的觀點，一個世代的精神面貌取決於其青年時期的社會和政治環境這論調，最少可以追溯至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 (1923)。在當代研究中，一些政治社會學者對集體回憶的分析，就深受Mannheim的世代論影響。實證研究亦發現，對人們的世界觀產生最深遠影響的政治事件，往往在人們年青時發生 (Schumann & Scott, 1989 ; Schumann & Corning, 2000)。

將稀有假設、馬斯洛的需求階梯，和社會化假設結合起來，Inglehart得出的預測是，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年輕的世代由於出生於物質較為充裕的環境中，所以會比年長的世代更傾向後物質價值。而且這個世代之間的差異是持久的：世代之間的差異並非只是「生命週期」(life cycle)的結果，即並非純粹由年青人和較年長人士之間生活模式和環境的差異所造成（如未結婚的青年人沒有那麼大的家庭負擔，所以可以表現得「後物質」一點）。在《Culture Shift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中，Inglehart運用了從多個歐美國家和日本得到的調查研究數據，引證這些預測的準確性。另外，他亦在個人層次的分析中引證成長期安穩度 (formative security) 與後物質傾向的關係，較為直接的展示社會化的效果。更具體地說，他的分析顯示，由教育程度、父親的職業，以及父母的教育程度所代表的成長期安穩度越高的人，其後物質價值取向會較強烈。

所以，正如文章開首所說，在香港有關青年人價值觀的討論中對後物質主義最直接的套用，就是指1980年代出生的年青人成長期安穩度比之前出生的香港人高，所以他們會嚮往後物質價值。不過，這種直接的套用忽視了一些後物質主義理論中較仔細或較具爭議性的地方，也同時忽略了過往香港有關後物

質主義的研究所顯示出的一些問題。首先，後物質主義中所指的物質價值和後物質價值究竟是指甚麼呢？Inglehart的研究中的所謂物質價值，其實是指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甚至是生存所須的東西，亦即是人身安全和三餐溫飽。他所指的後物質價值則關乎「尊嚴、自我表達和美學上的滿足」（Inglehart, 1990, p. 68）。在具體測量的時候，物質價值被操作化為受訪者會否視「維持國家秩序」、「對抗通脹」、「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加強國防」、「打擊罪案」等為重要目標，後物質主義則被操作化為受訪者會否視「讓人們對政府施政有更大發言權」、「保障言論自由」、「邁向一個更友善的社會」、「邁向一個理念比金錢重要的社會」等為重要目標。一邊是基本的物質需求，另一邊是跟物質基礎關係不大的公民價值。

在這裡，Inglehart至少忽略了兩種可能性，一是並不基本的物質訴求，二是實現某些後物質價值所可能需要的物質基礎。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當人們指一個人很「物質主義」時，大家通常是指這個人崇尚名牌、生活奢華等，而不是指這個人正辛勞地為養家活兒而拼搏。從此可見，人們對物質的需求並不一定會因為基本需求得到滿足而減弱，因為人們可以開始嚮往更稀有的物質滿足。同時，如果自我表達和美學上的滿足等算是後物質價值，那麼我們亦要留意，很多人的自我表達模式、美學上的滿足，甚至精神上的滿足往往是需要金錢的。一位天主教徒要到梵蒂岡朝聖、一個藝術愛好者想去巴黎和佛羅倫斯、一位攝影愛好者購買專業的攝影器材，都是需要經濟能力的。

以上所談兩種可能性帶出的理論問題，是一個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環境下長大的人，面對的選擇有甚麼呢？用較為技術性的語言說，後物質主義這概念所包含的是否只有單一維

度？現時有關後物質主義的文獻對此已有不少討論（Flanagan, 1987; Moors, 2003; Sacchi, 1998），例如：挪威學者 Hellevik（1993）認為Inglehart的物質和後物質主義之分實際包含著「理想主義／物質主義」和「傾向轉變／傾向穩定」兩個維度。Inglehart所談的對基本物質和安定的追求是物質主義和傾向穩定的結合物，Inglehart強調的後物質價值是理想主義和傾向轉變的結合。當物質主義和傾向轉變結合起來，就是消費和享樂，當理想主義和傾向穩定結合起來，就是對家庭和宗教等傳統價值的重視。

不過，今次調查研究仍會沿用Inglehart的二分法，一方面是因為不希望把問卷和分析過度複雜化，二是因為Inglehart的二分法仍符合本研究的關注點。再者，以上的批評其實並不全盤否定Inglehart的理論邏輯，只是要求我們對後物質轉向的看法作出修正。如果稀有假設和社會化假設成立的話，一個貧窮的社會中，所有人都只能顧著維生，持後物質觀念的人會非常少。當經濟發展之後，在充裕環境中長大的年青人至少較有可能轉向公義、包容等後物質價值。但有需要指出的是，這個轉變並不必然，一個世代轉向後物質價值，可能需要另外一些因素和條件的配合。

這亦帶我們到有關後物質主義研究的第二個關鍵問題，就是有什麼因素會影響人們的物質和後物質價值取向。如前所述，Inglehart強調得最多的因素是成長期安穩度，但從實證的角度看，肯定有多重因素可以影響個人價值觀。在研究文獻中較多討論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理解教育的影響。在Inglehart（1990）所作的分析中，教育是成長期安穩度的一項指標，這是因為收入較高的家庭，其子女的教育程度一般也會較好，但這亦代表教育程度在Inglehart的分析中只是家庭經濟狀

況的一項間接測量而已，他關注的並不是在教育過程中年青人可能接觸到的內容或可能出現的轉變。一些學者便認為Inglehart忽視了教育本身的作用（Warwick, 1998），如Duch和Taylor（1993）對八個歐洲國家的分析就顯示，當分開處理教育程度和成長期社會經濟狀況時，教育程度對價值的影響是較為顯著和一致的，相反，成長期社會經濟狀況只在比利時和丹麥顯示了一些影響（有關這問題的爭論，可參考Abramson & Inglehart, 1994, 1996; Duch & Taylor, 1994）。

廣義而言，有關應該如何理解教育對後物質主義的影響的討論，帶出了如何理解青年人的社會化過程的問題。教育是社會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指出教育對人們的價值有獨立而重要的影響，並不是要否定社會化的重要性，而是要正視社會化過程中的不同部分。例如：社會學者Gary Marks（1997）提出的分析框架，就指影響個人後物質價值理念有五大因素，分別為：1）來自父母親的社會化，亦即越傾向後物質價值的父母，會教出越傾向後物質價值的孩子；2）自己家庭內部的成長期安穩度；3）成長時期整體社會的安穩度；4）個人教育程度；和5）當代影響。在這五個因素之中，頭四項都和個人成長期的經歷有關，不過，1和4可能涉及較為直接的價值培養或灌輸，2和3則強調生活環境的影響。除此之外，亦有學者關注政治環境對後物質價值的發展的影響。例如：Warwick（1998）對世界價值調查研究（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作出的分析顯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和人們是否長期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相關。亦即是說，生活在民主社會之中，本身就有社會化的效果，會令年青人更傾向民主自由這些屬於後物質主義的理念。同樣地，Tranter和Western（2009）指出，如果一個國家或某一時期之中，關注環保問題的綠色政黨越活躍，在該國家或該時期中成長的一代的後物

質轉向會特別強烈。Tranter和Western（2009）認為，當綠色政黨較為活躍的時候，後物質價值會在社會上獲得更高的認受性，所以對青年人的影響亦特別大。

以上已經提到，經濟發展並不必然導致後物質價值的轉向。這裡需要指出，這點亦是Inglehart的理論本身承認甚至是強調的。在一定程度上，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理論其實是要強調經濟發展和民主發展之間的關係的非必然性。正如他所說：「雖然沒有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大眾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出現，但經濟發展本身並不帶來民主：除非在文化和社會結構上出現一些轉變，否則結果不一定是民主政制，而是其他可能性中的任何一項，由利比亞到蘇聯都是例子」（Inglehart, 1990, 頁65）。換句話說，Inglehart是反經濟決定論的，這亦代表Inglehart不可能認為經濟發展必定帶來價值轉變，因為這只會變成另一種經濟決定論。事實上，正如大部份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發現一樣，Inglehart指的經濟發展和價值轉變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或然率關係：經濟越發達的國家，其國民傾向後物質主義的比例通常會更高。但當我們拿一個個別國家或地區來分析時，其文化價值卻可能比其經濟發展走得更前或顯得落後。

將這一點放回世代差異的問題上，我們要注意的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世代轉變可能比單純按經濟發展所作的推測來得早或來得遲。過往的一些香港研究似乎都在指出香港是一個文化轉變滯後於經濟發展的案例。過往的香港研究中有不少學者通過調查研究數據顯示香港社會似乎在整體上有邁向後物質主義的情況，但卻鮮有數據顯示明顯的世代差異（Ma, 2011；Ng, 2006）。如：王家英和尹寶珊在2009年發表的文章，比較了2007和1992年的調查研究數據，指出香港社會似乎真的比

二十年前更傾向後物質價值，但當分析價值觀念和人口特徵的關係時，結果卻比較模糊。正如他們指出，香港在1970年代經濟起飛，若根據後物質主義原理論來看，在1960年代之後出生的香港人已屬享有比上一代較高的成長期安穩度，所以他們預期，1960年代之後出生的香港人會有更強的後物質傾向。他們在分析雙向變項關係時，最年輕的一群被訪者亦似乎真的比年長的被訪者傾向後物質價值，但世代之間的差異其實並不大，而且年齡與物質和後物質價值之間的關係在多變項分析中變得在統計學上不具顯著性。兩位學者所下的結論亦說，研究發現顯示後物質價值跟年齡甚至成長期安穩度均沒有關係（Wong & Wan, 2009）。

年齡和後物質價值之間在香港缺乏相關性，並不只是王尹二人的發現。何國良及梁世榮（Ho & Leung, 1995, 1997），以及張宙橋及其合作者等（Cheung et al., 2005; Cheung & Leung, 2004）較早年的文章，亦找不出證據顯示年輕人比上一代人更強調個人表達或其他後物質傾向。回到王家英和尹寶珊的文章，兩位就世代差異並不顯著這發現提出了三個可能的解釋。第一是指經濟發展和文化轉變之間可能存在著時間差（time lag）。這可能是對的，但我們亦知道經濟發展和價值轉變在很多其他國家中可以差不多同步進行，所以這論點並不算解釋了香港的情況，因為我們還是需要知道經濟發展和文化轉變之間的時間差是由甚麼做成的。王尹兩位的第二及第三點較有意思。他們指出，雖然香港在經濟上於1970和1980年代趨向穩定，但適逢中英談判和過渡期，香港社會狀況其實並不安穩。另外，香港較受外在因素，如中國的發展所影響，一些外在因素可能為1970和1980年代的香港社會帶來不確定性。第二和第三點顯然是共通的，這就是說1970和1980年代的香港社會並不安穩，所以在這環境下成長的一代並未有轉向後物質價值。

王尹兩位的說法值得參考，文章往後部分會回到他們的分析上。但到這裡為止，我們可以作一個小結，直至2007的調查研究為止，過往的香港研究並沒有在物質和後物質價值上發現明顯的世代差異。香港這案例說明了經濟發展本身並不一定足以帶來新世代的後物質轉向。要深入分析香港的情況，一方面要回頭探討香港社會發展的特徵，另一方面，後物質主義的研究文獻也可給予我們不少啟示。在得到基本物質安穩後，追求非物質性的理念和公民價值其實並非唯一選擇。青年人會追求更罕有的物質享受還是真的走向後物質價值，要視乎其他因素。在理論層次上，最重要的是要把年青人的社會化視為一個有多個層面的過程，在社會化中起作用的不只是經濟發展，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其他特徵也可能有其影響。

香港青年的後物質轉向？

討論過在理論層次上的概念問題之後，我們會在這一節分析香港文化指標調查研究的結果。此調查研究於2012年5月30日至6月13日期間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研究中心以電話方式進行。調查以隨機抽樣方式合共訪問了806名18歲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回應率以美國民意學會的RR6和RR3計算，分別為57.98%和38.36%。另外，在詮釋一些調查研究結果時，我們亦會借助文化指標計劃在去年進行的焦點小組研究。研究計劃從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總共組織了15個焦點小組坐談會。每個小組有五至七名參加者。其中4組以年齡劃分（1組由約35至55歲的市民組成，另外3組由15至30歲的市民組成），其餘11組則以地區劃分，如深水埗、太古城等。在選擇地區時，我們盡量包括不同地理位置（即香港、九龍和新界）及傾向不同社會階層的區域。

上文已經提及，Inglehart的研究以及世界價值調查研究的問卷，慣常用一種從四個目標中作選擇的方式來測量物質與後物質傾向。這次香港文化指標調查亦使用這方式。不過，調查總共設計了五個相關題目。表一展示了這五個題目和受訪者的答案。例如：第一題問到被訪者認為在「高經濟發展」、「發展基礎建設」、「令市民在工作 and 社區上有更大話事權」和「令香港的城市和郊野更美麗」之中，那一個是香港未來十年發展的最重要的目標。然後，調查會追問被訪者認為那個是第二

重要的目標。如表一所示，最多人選為首要目標的是「令市民在工作和社區上有更大話事權」(32.3%)。如果將兩欄的百分比加起來，得出的就是有多少人視某一目標為頭兩個選擇之一。在第一題中，「令市民在工作和社區上有更大話事權」是最多人選擇的一項(54.6%)。

調查使用了多個題目，是因為單一題目的答案可以引發不少歧義。如第二題，其實是直接引用自世界價值調查的，過往的香港研究亦有使用。第二題的兩個後物質目標，分別是「保障言論自由」及「令市民在政策制定上有更大話事權」。但這兩個項目都是和民主相關的政治理念，如果我們在調查中只有這一題，那麼我們並沒有能力分清楚一些特定群組的市民是真的較為傾向後物質，還是只是較為傾向民主。另外，從表一可見，

在第二題中最多人選擇為頭兩個目標之一的是「抗拒通脹」（58.3%），這很明顯地跟過去兩年香港的通脹問題有關。事實上，王尹兩位的文章中（Wong & Wan, 2009）提及了1992年進行的調查研究結果，就發現在同一個題目上，選擇「維持治安」的市民高達七成以上。但1992年的香港，剛經歷過葉繼歡在旺角鬧市開機關槍的一幕，市民自然認為治安是大問題。換句話說，若我們使用單一題目，我們會較難分辨市民的答案顯示的是一種整體的傾向，還是只是個別偶發事件的影響。

但當我們有多項題目時，我們便可以作一些計算和分類，個別事件對這些計算和分類的結果影響會較小。具體地說，在表一的基礎上，我們依從過往研究的做法把被訪者分為三類：物質主義者是那些選擇了兩個物質主義目標的被訪者，後物質主義者是那些選擇了兩個後物質主義目標的被訪者，混合型則是那些選擇了一個物質主義目標和一個後物質主義目標的人士。如表二所示，在每一條題目上，混合型都佔了多數，這亦吻合王家英和尹寶珊的研究結果。

由於問卷有五個題目，我們將五個題目加起來成為一個總指標。如果一個被訪者在一個題目上屬物質主義，會得零分，後物質主義得兩分，混合得一分，總指標就會是一個由0至10的

量表。為方便表達研究結果，我們再將在總指標上得0至3分的被訪者歸類為物質主義者，7至10分為後物質主義者，4至6分的則為混合型。如表二所示，較一面倒地傾向物質主義或後物質主義的比例都是較小的，佔多數的始終是混合型。

不過，若非透過跨地區或時間的比較，表二所顯示的物質主義者和後物質主義者的比例本身並不一定具備很確切的意義。對本文而言，重點則在於不同年齡層之間的差異。表三顯示了四個年齡組別之中的物質主義者和後物質主義者的比例。數據非常清晰的展現了世代差異。在最年輕的18至29歲之間的青年人中，後物質主義者佔三分之一，物質主義者只佔一成。相反，在最年長的一個組別中，物質主義者佔超過三分之一，後物質主義者則不足一成。這不同年齡層之間的差異不只在統計學上達顯著程度，在實際比例上也是明顯的。若再仔細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最年輕的一組是較為獨特的一群。從最年長的60歲或以上一組到30至44歲的一組，後物質主義者的比例只是上升了約8%。但從30至44歲的一組到最年輕的一組，後物質主義者的比例上升了18%。之前的討論已經提及，過往香港研究並未發現年齡和後物質傾向之間的關係，所以在今次調查研究中，年紀較大的組別之間在後物質傾向上差異不大，其實是跟過去研究發現是一致的。但今次調查結果顯示，在最新一代的年青人當中，似乎真的出現了一個後物質轉向。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我們不用後物質主義的總指標，而以表二的從每一題目得出的分類各自與年齡組別作交叉分析的話，年齡層之間的差異在頭四個題目上都達至統計學的顯著程度。在第五個題目上，年輕的一群亦較傾向後物質，只是差異未達至統計學的顯著度。整體來說，年齡和後物質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太受個別問題的設計和字眼影響。

除了變項間的雙向關係外，表四顯示了在多變項迴歸分析中，年齡層及其他人口特徵與後物質傾向之間的關係。表四較正式的引證了上述觀點。在迴歸分析中，30至44歲的一組被用作參考組別。所以，表四所顯示的是最年輕的「八十後」明顯地較被用作參考組別的30至44歲一組傾向後物質價值。不過，戰後的一代和戰前的一代跟30至44歲一組則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另外，家庭收入和後物質傾向之間有一顯著的正相關，女性亦都顯著地較傾向物質主義，這些跟過往西方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可是，跟西方研究的結果不一樣的是教育程度跟後物質傾向並沒有顯著關係。

我們可以怎樣理解現今香港社會中年青一代的後物質傾向呢？我們現時未必有足夠的證據去完全闡明這個問題，但結合過往香港研究的發現，今次調查的數據，再加上焦點小組的一些觀察，我們可以對幾種詮釋的可信度作出評估。第一個不能忽略的詮釋，是表三及表四的結果只是顯示著一種生命周期的影響。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代，年青人往往都較有理想。同時，很多二十來歲的青年人還沒有組織家庭，沒有子女的負擔，所以物質性的憂慮沒有那麼大。如果這個詮釋是對的話，那麼我們會預期今次調查中的年青人約在10年後就會開始變得較為物質主義，與此同時，新一代的後物質年青也會再出現。我們要有多年的調查結果才可正式驗證生命周期的影響。

雖然如此，我們至少有兩個理由相信，表三和表四的發現應該不會完全是生命周期的影響造成。首先，採用生命周期的說法，我們解釋不了為甚麼年齡層和後物質傾向之間的關係在過往的香港研究中沒有出現，就算年青人和年長者在所謂「理想主義」上真的有差異，這差異只在今次調查中才被顯示出來，就代表了這差異並非一個跟社會時空沒有關係的個人生命周期的問題。另外，在焦點小組討論中，我們會發現不少青年參與者的確有能力在談論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時表達一種具後物質傾向的說法。如家住天水圍的Amy，在被問到對一張粉嶺馬屎埔一片農田的照片有甚麼想法時，說：「我見到這張相，好慶幸還有人從事種田這個行業，因為香港都差不多給第三產業吞噬了經濟，所以都好慶幸還有從事農夫這些。」需要指出的是，Amy所表達的不是一種個人的理想主義和一種籠統的對大自然的嚮往，而是一種涉及對社會發展的觀察的說法。又例如家住馬鞍山的Herman，在討論到舊區重建和保育問題時說：「不能說所有東西都拆掉而推倒重來，一個城市為甚麼會有一個歷史記憶，有一種文化存在，就是因為他有一個空間去發展某些

東西，或者持續發展某些東西。」當然，Herman和Amy都是大學生，Herman主修的更是政治，Amy則屬工商管理。教育程度雖然在統計上跟後物質價值傾向沒有關係，卻應該跟用語言來表達後物質價值的能力有關。這裡想指出的重點是，對至少一部分青年人來說，後物質傾向不只是對問卷問題的回應，亦不只是一種個人化的理想主義，而是一種會在討論到具體社會議題時會通過某些論述而被表達出來的東西。這現象似乎並不能歸因於生命週期。

第二種對青年人的後物質傾向的詮釋，是回到Inglehart的原理論再加上之前提及王家英和尹寶珊的說法，就是說在安穩的社會成長的青年人會傾向後物質價值，但在香港，高速經濟發展雖然在1970及1980年代已經出現，但回歸帶來的信心危機，卻令早應出現的後物質轉向遲了十數年。再者，若對照香港從過渡期到回歸後的社會狀況，這說法似乎亦不成立。首先，過渡期的政治不穩如果真的對香港人的價值觀念有影響，那影響似乎是令香港人更傾向後物質主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六四事件後香港人大幅度地激起對民主發展的支持（So, 1999）。如果說一個197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會成長於社會氣氛不安定的過渡期之中，那麼一個1980年代後半至1990年代初出生的青年人（即今次調查中最年輕一群），成長於當年香港市民戲稱為「建華八年」的時代之中，面對亞洲金融風暴及其帶來的各種後遺症中，還要碰上史無前例的沙士疫情，社會不穩程度比過渡期應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按照王尹二人的說法再作推論，後物質轉向仍然不應該出現。

第三種詮釋，是回到文章開首時引述左霏（2010）的說法，就是說香港的確仍然未進入一個真正安穩的時期，但在近十年香港社會制度不公的問題越益嚴重和明顯的情況下，年青

人「看穿」了社會現狀和經濟發展的虛妄，所以在安穩還未被滿足的情況下就已轉向後物質。我們可以將左罪的觀點分為兩部分，一是香港的後物質轉向和年青人如何看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二是稀有假設在香港不成立。從現有的研究資料來看，第二部分是不符實情的。表四已經展示，家庭收入越高的香港市民越傾向後物質主義，這在不同年齡層中都是一樣的。這正顯示了稀有假設在香港仍然是重要的：後物質轉向在經濟能力高的一群中較易出現。這點亦可佐證於焦點小組的發現。如談到舊區重建保育時，屯門的Eason就支持拆掉所有舊樓，「因為我覺得可以解決到社會問題，即是現在買樓很貴，但是你幻想有一日，九龍城的舊樓、深水埗、荔枝角全部舊樓，可能只有六、七層高的舊樓全部拆掉……會否解決了這個房屋問題呢？」在另外一兩個組別中，也出現類似的論調，如有一位青年人覺得發展南生圍也許有助壓低樓價。重要的是，這些論調都出自來自草根階層和社區的青年人，太古城、半山區，或馬鞍山區的焦點小組中沒有出現類似的論調，這正符合稀有假設的預期。但左罪的評論中的另一個重點，即時下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傾向跟他們怎樣看待社會經濟制度相關，卻跟我們的研究發現吻合。我們將在下一節作討論。

後物質轉向的社會和政治背景

如上所述，焦點小組中發現不少青年人會在回應具體問題時表達出一種後物質傾向，個別年青參與者在表達後物質傾向的同時，的確會將其跟一種對社會和經濟狀況的批評連繫起來，如Tommy在被問到如何看待發展和環保之間的平衡時就說：

「我自己覺得，經濟繁榮對我來說不重要，因為favor不到我，因為你起高鐵，我不會這樣回大陸嘛，我不是生意人，不需要幾小時生活圈。你說第三條跑道，我不是日日飛的，favor不到我。南生圍起個高爾夫球場，我不會打的，我覺得你所謂的經濟繁榮都favor不到我們大眾的小市民。」

這不代表Tommy覺得自己的將來會很不安穩，只是既然持續的高速經濟發展與自己無關，那麼當然環保會較為重要。對Tommy來說，根本不存在發展和環保之如何作出平衡的問題，因為若經濟發展根本對小市民沒有意義時，發展本身就沒有價值。

香港從1970年代之後，發展出一套主流論述，大意是香港的繁榮是香港人努力的成果，在個人層次上，香港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而且在總體上說亦算平等，只要一個人願意努力，他就可以向上流動。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說法反映了一個時代的香港人的人生經歷。但這種想法是否仍為大眾所接納？

如表五顯示，在2012年的調查中，仍有超過六成受訪市民同意個人努力和能力是決定一個人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但對於香港社會存在著很多向上流動的機會這點，同意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同意香港社會上人人享有平等機會的市民亦不足一半。由此可見，整體香港社會已經不是真的那麼全面擁抱較傳統的一套機會論。相反，表五顯示，近四分三市民同意香港社會給大財團控制，超過一半市民認為財富分配不合理。同時，市民對未來的社會發展趨勢並不樂觀，認為香港在貧富差距、制度公平、上流機會這些問題上會變差的市民遠比認為會有改善的市民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市民並非對個人前景感到悲觀，認為自己家裡的生活狀況在未來幾年會變差的市民亦都不足兩成。

對本文的討論更重要的，是不同年齡層在這些問題上的差異。為簡化大量題目和數據的分析，我們把相關的問題以取平均分的方法得出一個指標。機會論和財團霸權為1至5分的指標，越高分代表越同意該論點。對未來社會趨勢和對未來家庭狀況評估則是1至3分的指標，越高分代表越悲觀。表六顯示，最年輕的一組的確比其他年齡組別沒有那麼支持傳統的機會論。同時，年齡和對財團霸權的認知亦有強烈相關，較年輕的市民較認同財團霸權的存在。不過，年齡跟對社會和自己家庭未來的評估則沒有顯著關係。

由此可見，年青人並不像一些社會輿論所說的，對自己的未來特別悲觀，所以也有特別大的怨氣。他們跟較年長市民的差異，是他們不只較傾向後物質價值，也對現時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和制度持更負面的態度。作為統計變項，對機會論的看法，對財團霸權的認知，以及後物質傾向是相關的：越不認同機會論的人越有後物質傾向（ $r = -.10, p < .001$ ），越認為財團霸權存在的人亦越有後物質傾向（ $r = .23, p < .001$ ）。

這不代表年青人的後物質傾向完全是他們對社會的批判的結果。首先，如果青年人和前幾代香港人在後物質傾向上的差異可以完全由他們對社會經濟制度的不同批判程度來解釋的

話，那麼後物質傾向和年齡在統計上的關係應該在控制了機會論和財團霸權認知後消失。但分析結果並非這樣：在多變項分析中，當機會論和財團霸權認知被控制之後，年齡層和後物質傾向仍有很顯著的關係。

另外，我們亦要留意後物質主義和社會經濟批判之間的因果關係。年青人可以因看到社會的不公義而轉向後物質價值，但亦可以因轉向了後物質價值而開始意識到社會的不公義。在現實中，最有可能的情況是這兩種因果關係同時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年青人的後物質傾向和對社會經濟制度的批評是扣連在一起的。

我們認為，這些結果指向的是香港時下年青人的後物質轉向的一個重要背景。九七金融風暴帶來了六年的經濟下滑，2003年後經濟狀況則有所回升，直到2008年的金融海嘯為止。但這十數年的經歷帶來的，是傳統香港敘述的失效（Ku, 2001），貧富差距的問題變得更加顯著。用以測量香港社會的財富不平等程度的堅尼系數，在1991年已經達至0.48，到了1996年更達至0.52。不過，1990年代的香港市民對貧富懸殊問題未必有現在那般關注，一定程度是因為機會論仍然在發揮效用：如果貧富差距是個人努力和能力而造成的，那麼無論差距有多大，都是沒有構成一個基本的道德和公平問題。但當機會論失效時，貧富差距就成了一個社會公義的題目。同時，2003年後，香港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但堅尼系數在2006年卻仍高企於0.53以上。經濟好轉，貧富差距卻在擴大，而過往將貧富差距合理化的機會論又開始失去其信用，令一部分在這環境下成長的青人走向後物質價值。

不過，除了社會不平等的持續和機會論的失效外，1980和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的成長期有另外一個特點也是不

能忽略的，就是他們成長在一個主流民意傾向發展民主政制，同時局部的民主制度亦業已存在的時空之中。在這一點上，今次的調查研究有一個有趣發現，可以間接地引發我們去思考年青人的後物質傾向和民主政制之間的關係。西方對後物質主義的討論，往往用後物質主義來解釋新社會運動的興起。在實證研究中，後物質傾向往往跟集體行動的參與相關，這點在王家英和尹寶珊的研究（Wong & Wan, 2009）中亦被顯示出來。至於我們在2012年的調查，如表七所示，在18至29歲的被訪者中，後物質傾向跟遊行集會參與有顯著的正相關，同樣的正相關亦存在於30歲或以上的被訪者中。但有趣的是，在30歲或以上的被訪者中，後物質主義和在立法會選舉中的投票參與是呈顯著正相關的。但在18至29歲的青年之中，後物質主義和投票則沒有關係¹。

1 由於對上一次立法會選舉已是2008年的事情，所以18至22歲的受訪者的價值取向不可能跟投票行為有關。但就算我們將年齡組別收窄，撇取在四年前未有投票權的青年，結果在整體上仍然會跟表七的一樣。

這發現不難理解。對早一些時代的香港人來說，在選舉中投票是一種爭取回來的權利。如果後物質主義的意義包括要求讓人們在社會及政策問題上有更大話事權，那麼議會民主和選舉正是需要爭取的東西，爭取到的時候固然就要使用。但對一位1980年代後期出生的青年來說，議會民主是從小就存在的東西，再加上香港民主制度的缺憾，在行政主導的架構下議會實際權力的缺乏，自然會追求另外的表達和爭取話事權的模式，這可說是稀有假設的另一種呈現。

對本文的討論來說，表七最重要的意義，反而在於它間接地指出了年青一代成長時期的政治背景是可以跟後物質傾向產生關連的。在討論西方研究結果時我們已經提到，一些研究發現安穩度對後物質價值的影響在民主國家中更大（Warrnick, 1998）。李立峯與陳韜文有關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集體回憶的研究中亦發現，香港的年青人往往在成長過程中通過由傳媒、學校和家庭組成的一張制度之網（web of institutions）中獲取到有關六四事件的知識和其背後的道德判斷（Lee & Chan, 即將出版）。亦即是說，不少現今的香港年青人，其成長經歷中有一個政治社會化的層面。這政治社會化過程可能涉及對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議題的認識，更廣義地說，這政治社會化過程令年青人接觸到一些如民主、自由、公義、包容等公民價值。這些價值本身既屬於後物質主義，同時亦可以成為個人接納其他後物質價值的基礎。

總結和討論：在物質對後物質之外

結合以上的發現和詮釋，再加上之前對後物質主義理論本身的討論，我們可以對香港當今年青一代的價值轉向作一個概括。香港社會在經歷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後，已經算是具備了後物質轉向的基本物質條件。雖說香港人從1980年代至今仍要面對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但政治上的不確定性不一定妨礙後物質轉向，安穩度始終是一個程度問題，相比起1950年代的木屋區、1960年代的制水、每逢颱風暴雨都會觸發山泥傾瀉並引致傷亡，不能不說1970年代後的香港社會較為安穩。但197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並不比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更後物質。在理論上，從基本的物質滿足到非物質性的後物質價值的轉向，本來就不是必然的。一個得到基本物質滿足的人可以追求更難得的物質滿足。只有當其他一些條件出現和配合時，一個社會才會較明顯地出現Inglehart原理論中所預期的後物質轉向。

在香港，我們這次的文化指標調查研究發現了年青一代後物質轉向的初步證據，配合過往香港研究的發現以及焦點小組研究的觀察，相信由調查研究顯示出來的後物質轉向並非只是生命周期的影響。我們認為，要理解這群青年人的後物質轉向，就要思考他們的社會化過程。換句話說，本文仍然接納Inglehart對社會化的重視，但卻認為社會化不應只是指一個

人成長時是否活得安穩²。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的成長環境，除了較幾十年前的香港安穩外，同時還是一個民主自由理念已經成為主流民意並開始滲透於社會生活的不同層面的時代，面對九七回歸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政治上的壓迫感，更可能使得這些政治理念在公共領域中更為顯著。事實上，有關「核心價值」的論述亦在這個時期和環境下成形。與此同時，九七金融風暴令香港經濟神話破滅，從上世代的人生經歷中提煉出來的機會平等說，即以個人努力就能達致成功的論述開始失去公信力，當這論述失效時，那些早已存在的貧富懸殊問題便不再被視為公平競爭的公平結果，而是變成了社會不公義的有力證據。這些政治和社會條件輔助了新一代青年人的後物質轉向。

以上整個對後物質轉向的詮釋，有一些部分是需要更多的研究結果來驗證的，但它只少跟現有的為數已然不少的研究發現吻合，亦應該吻合於一般對香港過去三十年來的社會轉變的理解。另外，有一點值得再次提出：從焦點小組的觀察所得，當下年青人的後物質轉向的特色之一，是他們有能力去用一套語言去表達和辯論一些如保育等後物質議題，同時，一些能通過統計分析引證的關係，如對當今經濟發展中的不公義的批判和後物質傾向的關係，個別青年人可以自己頗為完整地論述出來。要留意的是，通過量化研究找到的人們的社會心理特徵變項之間的關係，跟人們平時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出的思想，很

2 在香港研究中，何國良及梁世榮早年對物質和後物質價值的分析也強調過要將社會化過程作仔細分析這一點（Ho and Leung, 1995, 1997）。不過由於早期香港研究並沒有發現年青人的後物質轉向，所以何梁兩位當時強調的是教育制度和家庭兩個重要的社會化環境在80年代的香港未能灌輸或培育後物質價值，而本文則是通過強調整體社會和政治環境轉變對年青人成長時期的社會化的影響，來解釋當下香港社會出現的年青人的後物質轉向。

多時候是不一樣的。如在香港做選舉投票行為研究，研究者大概會發現有政黨認同的市民會更傾向去投票，但在電視機上看記者做街頭訪問，極少人會說自己是為了支持某政黨或候選人而去投票的，絕大部分的普通市民都會說自己是因為公民責任而投票。所以，不少年青人可以自行論述到一些後物質主義觀點，是有重要意義的。後物質主義並不只是一種可以通過問卷測量出來的人們心裡的「態度」，同時也是一堆符號和論據，這些符號和論據在當今香港的公共領域中有所流通，正如文章一開始所言，Inglehart大抵自己也想不到會在這個年頭於香港的公共論述中那麼受重視。有關後物質主義的符號和論據的建構和流通，明顯也可說是推動著年青人以至整個社會的後物質轉向的力量之一。

話雖如此，我們亦不能過份高估和跨大後物質轉向的程度。在這文章結尾部份，我們想提出三點觀察和反思。首先，今次調查研究發現的香港市民中的後物質主義者比例只有約六分之一。就算只看表三中最年青的一群，後物質主義者的比例，亦只有約三分之一。如一些評論者提過，亦如我們在焦點小組中觀察到，強調經濟發展仍然重要，甚至對個別保育運動持批判態度的青年人仍有不少。從另一角度看，香港市民中佔多數的是「混合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市民大眾很難完全不顧慮一些基本的物質需求，今時今日在香港社會的整體安穩度亦不一定很高（對個別社會階層的市民來說尤其如此）。例如：表一所展示的第二條題目的四個選擇中有「抗拒通脹」一項，在近兩年香港通脹高企的狀況下，有近六成的市民選擇它為首兩個目標之一是可以理解的。又例如表一所示的第一條題目中，選擇高速經濟發展的市民不到一半，但在第三題中，選擇穩定經濟的則高達七成。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兩條題目中的其他選擇的「吸引程度」不一樣，但這差異亦顯示了市民對

物質的追求始終是一個程度問題：一些不追求高速經濟發展的市民可能仍然認為穩定的經濟狀態很重要。

其次，我們要留意論述和行為之間可能出現的差異。一位被訪者在回答問卷題目時指香港需要發展成為一個市民擁有包容的態度的城市，不一定等於他自己在生活中會包容身邊不同族群的人。在我們的焦點小組訪談中，也有出現了一些「言行不一」的案例，例如在屯門區的討論小組中，一些年青人在討論到香港的消費文化時，會就著一張領匯商場的照片來批判連鎖店的壟斷問題，但同一批年青人在討論屯門區的變化時，卻會指出屯門新城市廣場在過去幾年有一些連鎖店進駐，令他們在生活上方便了不少，因為他們不再需要「吓吓出旺角」。在文章分析部分，我們指出後物質主義不只是一種青年人回應問卷題目時所顯示出來的態度，也是一套他們在討論社會問題時會實際運用的論述，我們相信這論述在年青人之間的「流行」，對他們的行為是應該有影響的，但這不等於年青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完全不受例如習慣或利益計算等其他因素左右。後物質主義的日常實踐是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

第三，本文沿用後物質主義研究的傳統路徑，把物質價值和後物質價值二分。這二分法一方面讓我們較簡單清楚地看到一些文化轉變的指標，但正如文章討論時已提及，後物質價值的實現可能需要物質的基礎。這帶出的乃是一個在社會生活中物質生活和後物質生活的扣連問題。在今天香港社會中一些人的「後物質追求」，無論是自我表達、身分認同、生活質素等，有多少是可以跟物質基礎脫鉤，有多少是需要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才能享受的呢？在文章開首時曾經提到，不少評論者指出香港的年青人也有其「物質主義」的一面，如喜歡消費。故此，分析後物質價值和物質基礎之間的關係，可能正是我們理

解後物質轉向和消費主義如何共同存在的關鍵。廣義一點來說，一個社會如何建構後物質想像，會直接影響到後物質轉向的效果和意義。

參考書目

- 左霏。2010。「『八十後』與『後物質主義』」。《信報》，1月30日。
- 林慧時。2010。「張小康 林慧時x 物質生活」。《明報》，8月29日。
- 施家潤。2010。「八十後，起義？」。《信報》，1月26日。
- 馬傑偉。2010。「青春祭」。《明報》，2月5日。
- 陳雲。2010。「非物質」。《信報》，2月19日。
- 葉秋。2007。「後物質社運」。《明報》，8月9日。
- Abramson, P.R., & Inglehart, R. 1994. "Education, security, and postmaterialism: A com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3), 797—814.
- _____. 1996. "Formative security, education, and postmaterialism: Respons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0(3), 450—455.
- Cheung, C. K., & Leung, K. K. 2004.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modern and postmodern value orientations of Hong Kong citizens."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1(3), 347—361.
- Cheung, C. K., Leung, K. K., Chan, W. T., Ma, S. K., & Ngan, R. M. H. 2006. "Self-expressive orient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y taxes and public fee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8(1), 107—118.
- Duch, R. M., & Taylor, M. A. 1993. "Post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 cond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3), 747—779.
- Duch, R.M., & Taylor, M. A. (1994). Education, security, and postmaterialism: Repl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3), 815—824.
- Flanagan, S. C. 198). "Changing valu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A rejoinder to Inglehar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5, 99—128.
- Hellevik, O. (1993). Postmaterialism as a dimension of cultural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5(3), 211—233.
- Ho, K. L. & Leung, S. W. 1995. "Materialism and political attitude. In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L. Wong,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3* (pp. 229—257).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_____. 1995. "Post-materialism revisited." In S.K. Lau, M.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5* (pp. 331—358). Hong

-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u, A. S. 2001. "The "public" up against the state: Narrative cracks and credibility crisi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8(1), 121—144.
- Lee, Francis & Chan, Joseph. forthcoming.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Tiananmen in Hong Kong: How young rally participants learn about and understand June 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Mannheim, K. 1972.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Marks, G. N. 1997. "The formation of materialist and postmaterialist valu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6(1), 52—68.
- Moors, G. 2003. "The two faces of (post)materialism: A decomposition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5(4), 396—412.
- Ng, C. H. 2006. "After the crises: Changes in social ethos." In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pp. 265—284).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acchi, S. 1998. "The dimensionality of postmaterialism: An application of factor analysis to ranked preference data."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4, 151—175.
- Schuman, H., & Corning, A. D. 200). "Collective knowledge of public events: The Soviet era from the Great Purge to Glasno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913—956.
- Schuman, H., & Scott, J. 1989. "Genera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359—381.
- So, A.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ranter, B., & Western, M. 200). "The influence of Green parties on postmaterialist valu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0(1), 145—167.
- Warwick, P. V. 1998. "Disputed cause, disputed effect: The postmaterialist thesis reexamined."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2(4), 583—609.
- Wong, K. Y., & Wan, P. S. 2009. "New evidence of the postmaterialist shift: The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2(3), 497—515.